

关名义作形式上的决定，然后强迫群众参加。

二月十七日早晨，在沈阳南市场召开所谓“市民大会”的时候，日本飞机在空中散发传单，日本军警全体出动，进行监视。汉奸赵欣伯主持会场，好象唱野戏一样，毫无秩序。为了招引群众，事先预告到会者能领一包点心，白看半天戏；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时，在“自治指导部”大礼堂（同泽女中校址）召开伪“全省联合大会”，强迫代表通过宣言及决议；二十九日正午，先在“自治指导部”礼堂召开了所谓“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”，除强迫代表通过大会宣言及决议外，又有所谓“紧急动议”，选出十一名代表迎接溥仪。午后三点，由一个穿中国装的日本人（鹤原义），手执伪旗领路，分乘六十多辆汽车和二十多辆卡车，举行游行，五点左右，这幕丑剧方告结束。

吉林、哈尔滨、齐齐哈尔各地的“促进建国运动”也都如法炮制。在整个“运动”过程中，只有一小撮汉奸卖国贼甘心效犬马之劳，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被迫参加游行，俨同俘虏，含有无限亡国之隐痛！

日本侵略者为了壮大声势，甚至把辽西请赈灾民二百多人，也强迫充当辽西八县代表参加大会。

五、溥仪粉墨登场

1 充当傀儡

溥仪被软禁在旅顺以后，每天受着甘粕和上角的监视，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，不准接见其他人。

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，板垣奉关东军司令官之命，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真意。溥仪虽然同意当“新国家”的“元首”，但是主张恢复帝制，保留“皇帝”的称号。^①这与关东军的想法根本对立。板垣了解到郑孝胥父子远比溥仪、罗振玉“灵活”，不象他们那样坚持要大清复辟，因此乐于以郑孝胥为交易对手。从此以后，郑孝胥便胜过了他的对手罗振玉，成了关东军的红人。

板垣虽然知道溥仪恢复“帝制”的要求，但他仍然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，操纵“东北行政委员会”通过一项决议，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“共和国”。溥仪听到这个消息，感到失望和愤慨。当然，溥仪愤慨的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，要把中国东北变为殖民地，他所关心的只是复辟，自己要当皇帝。当时，溥仪写了十二条必须恢复帝制的“理由”，叫郑孝胥、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。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，郑、罗二人在沈阳旅馆同板垣会谈，主张恢复帝制。^②但是板垣只是表示理解，没有采纳恢复帝制主张。

本庄繁根据板垣、和知各参谋的报告，立即派板垣去旅顺，同溥仪进行会谈。

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，溥仪会见板垣。^③板垣表明他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，向溥仪谈关于“建立满洲新国家”的问题。板垣说：“这个国家名号是满洲国”，是“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，即满族、汉族、蒙古族、日本族和朝鲜族。”然后，板垣从皮包里又拿出了五色的“满洲国国旗”，放到溥仪面前的沙发桌上，溥仪生气地问：“这是个什么国家？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？”板

① 参考日本《板垣征四郎秘录》，第64页。

② 参考《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》，第145页。

③ 参考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304—305页。

垣照样不紧不慢地回答：“自然，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，这是一个新国家，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，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，就是‘执政’。”溥仪一听板垣叫他“阁下”，更气得要命，认为“宣统帝”或“皇帝陛下”的称谓就此被人取消了。这时，溥仪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！”不能取消大清皇帝这个称谓，“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。”

板垣接着说：“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，就不用这个字眼。这不是共和制，是执政制”，但是“所谓执政，不过是过渡而已”，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，“必定能恢复帝制的宪法。”溥仪听到“议会”这两字，连忙摇头说：“议会没有好的，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！”他们争了三个多钟头，溥仪始终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身份。于是，板垣冷冷地说道：“阁下再考虑考虑，明天再谈。”便告辞走了。

当溥仪拒绝了板垣之后，郑孝胥就提醒溥仪说：“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，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，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。”溥仪一听这话，又害怕起来。果然，第二天早晨，板垣便把郑孝胥、罗振玉叫到大和旅馆，进行威胁地说：①

“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。如果不接受，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，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。这是军部最后的话！”

溥仪听到这个回答，便怔住了，其他人也不言语。最后，溥仪和他的近臣被迫答应：“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，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，到时即行退位。”②于是，郑孝胥等便以此为条件去找板垣说说看，结果板垣表示同意。溥仪就是这样抱着未来“复位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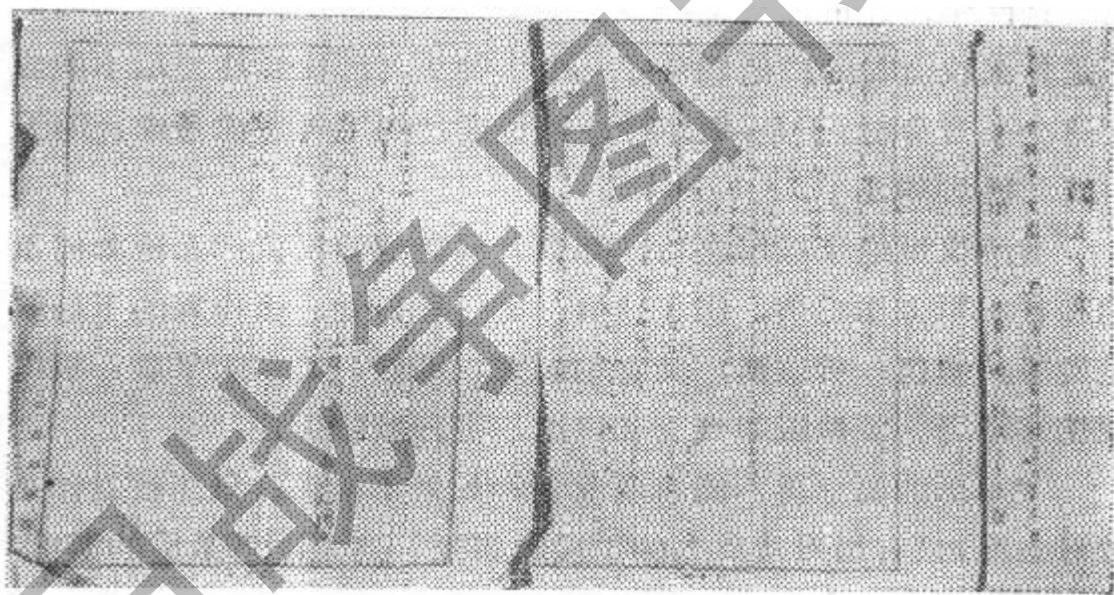
① 见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306—308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308页。

极”的幻想，公开走上了叛国投敌的卑鄙无耻道路，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份，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血腥统治中国东北十四年充当了帮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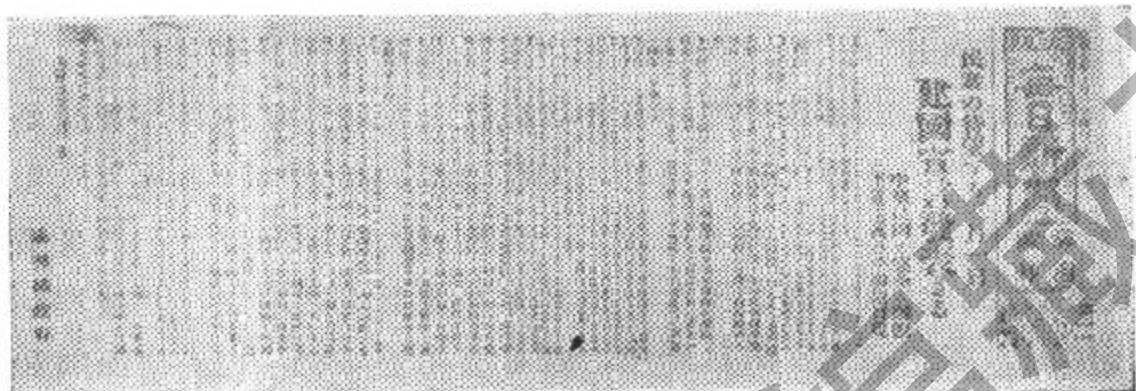
2 汉奸“请驾”

让溥仪登上伪满洲国“元首”的宝座，总得走个过场，有个程序才行。因此，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，由板垣导演，“东北行政委员会”发表宣言，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“独立”，然后决定



“独立宣言”草稿

成立伪满洲国，设伪都于长春。二月二十九日，关东军又强迫所谓“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”通过决议，选出代表“敦请”溥仪出任“执政”。三月一日，更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，发表了一个所谓“建国宣言”，宣布伪“满洲国”的成立。



日本《大阪每日新闻》发表的伪满洲国“建国宣言”

就在二月二十九日这天，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溥仪，“代表”们要来旅顺“请愿”，须先准备两个答词，第一个是表示拒绝，经“代表”们二次恳请，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。果然，在三月一日，以张燕卿、谢介石、葆康等六名“代表”到达旅顺，作第一次的“请驾”。这时，溥仪仿照历史上“帝王”的“谦虚”，叫郑孝胥先代表自己接见，拿出了第一个答词，表示推让。三月四日，按照关东军的安排，“代表”人数增到二十九人，作二次“请驾”。这时，溥仪故作忸怩不安之态，拿出第二个答词，表示“暂任执政一年”。最后，又由张景惠、赵欣伯、谢介石等作第三次“请驾”。

走完“过场”，三月六日午前七时，溥仪携带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，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，由旅顺到达汤岗子。张景惠、赵欣伯、张燕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，表示“恭迎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板垣、片仓衷等赶到汤岗子，同汉奸郑孝胥研究“最后的人事”，签订“密约”，进行了肮脏的政治交易。郑孝胥以出卖我国东北的“国防”、“治安”、铁路、港湾、矿山等为代价，换取了溥仪当伪满洲国“执政”和他自己当总理的傀儡头衔。

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，溥仪在一群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簇拥下乘车到达长春。车站到伪政府一路，警戒森严，车站临时设有“承宣处”，^①以备各界签到及领取佩花。花分黄红两种，黄花是给被指定的“各界代表”用的，红花是给被指定的“各界人”用的。另外，又有前吉林老八旗人，自称“大清国旧臣”，手执黄缎长方旗，组成所谓“迎銮团”，^②也到车站被指定的地点，为“接驾”作陪衬。在“迎驾”的队列里，既有穿袍子马褂，也有穿西装和日本和服的，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。

当溥仪乘坐的专车到达车站时，就在汉奸张景惠、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甘粕、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，军乐声和人们呼叫声混杂在一起，熙洽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他看，弄得溥仪昏昏然，又觉得他的复辟“是大有希望的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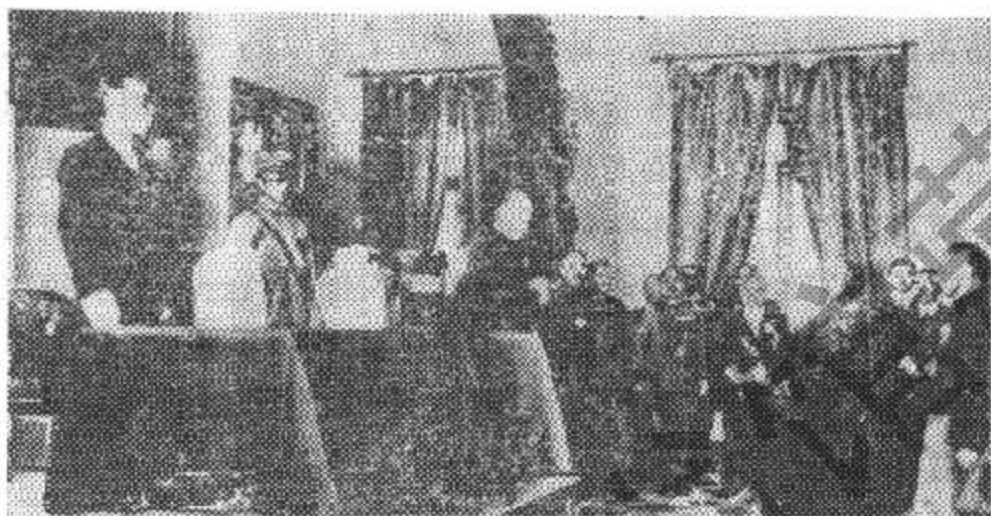
溥仪坐上了汽车，被送到一所从前是道尹衙门的破旧不堪的院落里，这就是溥仪的“执政府”。^③

三月九日，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，举行了溥仪的“就职典礼”。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、“满铁”总裁内田康哉、参谋长三宅光治、参谋板垣等都先后到场。参加“典礼”的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、罗振玉、胡嗣瑗、陈曾寿、宝熙等人外，还有汉奸张景惠、熙洽、臧式毅、张海鹏等。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、以及蒙古齐王也前来参加“典礼”。当时，日本侵略者为了防止意外，限制甚严，都以黄色为标志，没有标志的，不准入内。甚至连新闻记者的入门证，也得有“关东军司令部”的字样。溥仪穿西式大礼服，正式就任伪满洲国“执政”。由张景惠和臧式毅二

① 明、清于各省置承宣布政使司，掌管民政。这里所指的“承宣处”，是管理收发和接待等事务的机构。

② 即由汉奸熙洽、荣孟枚发起组织的所谓“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”。

③ “典礼”后一个月左右，“执政府”迁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樵运局的房子。



溥仪执政就任式

人献上了伪“执政印”。内田康哉致了祝词，罗振玉代读溥仪的答词。

伪满洲国的出现，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。战后，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受审时供认，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是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炮制、由他批准的。战犯大川周明则进一步供认，伪满洲国是日本政府批准关东军计划的产物，因为事前有了周密的计划，所以伪政权的建立，进展得非常迅速。

就在溥仪当上“执政”的第二天，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，由溥仪签字，任命一小撮卖国军阀和汉奸，充当了伪满洲国政府的官吏。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兼伪文教部总长，臧式毅任伪民政部总长兼伪奉天（即辽宁）省长，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，熙洽任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，谢介石任伪外交部总长，冯涵清任伪司法部总长，张燕卿任伪实业部总长，丁鉴修任伪交通部总长。此外，赵欣伯任伪立法院长，于冲汉任伪监察院长，张景惠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伪北满特别区长官等。其中，

除了马占山之外，都是死心塌地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。

马占山一度动摇妥协，被诱逼参加了溥仪的“就职典礼”，并被任命为陆军部总长（事先并未征得马本人的同意）。但马通过所见所闻，感到自己是受骗上当，且日人管束太严，傀儡滋味并不好受，便在四月一日突然率队反正，出走黑河，重新举起抗日旗帜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制造伪满洲国的内幕。当时，日本侵略者正想乘国联调查团到来的机会，把成立伪满洲国说成是“民意”使然，并要大肆宣传一下伪满洲国的“王道”，不料被马占山这样迎头一击，弄得非常难堪。

伪满洲国成立后，日本政府作贼心虚，没有立即承认，他们不能不考虑国际上对伪满洲国出笼的反应。当时，由英、美、法、意、德五国组成的国联调查团，正启程来华，四月到达我国东北。后来，国联调查团的活动表明，它们继续推行姑息养奸的政策。因此，日本帝国主义便有恃无恐，更加放手在中国东北大干起来。

3 “日满议定书”及密约

日本帝国主义者费尽气力，说什么“满洲国”是个“独立”的国家。但是，谎言掩盖不住事实，他们所拼凑的伪满洲国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。

伪满洲国政权的傀儡性，在溥仪上台“执政”时交出的一纸卖身契上表现得最为清楚。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，也就是溥仪当了“执政”的第二天，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，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可耻的卖国密约。

这个卖国密约的主要内容有：（一）所谓“满洲国”的“国防及维持治安”，全部“委诸”日本管理，所需的经费由伪满负担；（二）

伪满的铁路、港湾、水路、空路、包括增加修筑，均“委诸”日本管理；（三）日本军队所需要的“各种设施”，由伪满政权“竭力援助”；（四）日本人得充任伪满官吏，而其“保荐”和“解职”均由关东军司令决定。^①

半年后，日本政府为了把伪满洲国打扮成一个“独立国”，又演出了一出承认“满洲国”的丑剧。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，日本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，在长春签订了《日满议定书》。同一天，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承认“满洲国”的声明，公然宣布正式承认伪“满洲国”。《日满议定书》主要内容有两点：（一）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“一切权利和利益”；（二）在“日满共同防卫”的借口下，确认了关东军对“满



“日满议定书”签字式

^① 日本《现代史资料》第7卷，第408—409页。

洲”的实际统治。^①在《日满议定书》里，不仅保留下了上述密约，而又增加了新的密约，如日本有权开发我国东北的矿业资源，而国防上需要的矿业资源要由日本政府决定，等等。^②日本帝国主义者作贼心虚，为了掩人耳目，这些作为附件，没有敢公诸于世。但是白纸黑字，事实俱在，《日满议定书》及其附带的密约，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罪证。通过这个奴役性的条约，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东北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权，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。所以，日本和伪满之间的关系，根本不是什么国家关系，而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主子与奴才的关系。不论日本帝国主义玩弄什么“承认”“新国家”的把戏，或者打扮成“独立国家”的样子，都不能改变伪满洲国作为殖民地傀儡政权的性质。伪满洲国之伪，就伪在这里。

被辛亥革命赶下台的溥仪，原是抱着复辟清朝的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。他想当复辟的皇帝，而不想当那个“执政”。然而，关东军炮制的内部文件中，早就给他规定了傀儡和走狗的地位，特意写了一笔：“新国家避忌复辟的色彩”。^③两年后的一九三四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的“满洲国”，打扮得更象个“王道国家”，把它改名为“满洲帝国”。溥仪总算过了皇帝瘾，由“执政”当了“皇帝”，年号“康德”。但不论当“执政”还是当“皇帝”，一切都得听任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，溥仪只不过是个儿皇帝而已！

① 日本《现代史资料》第7卷，第496—497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503—504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961页。